

● 中国文学

外国文学与萧红的审美观照

张 华

(佛山大学 文学院, 广东 佛山 528000)

[作者简介] 张 华(1957-), 女, 浙江定海人, 佛山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语言文学研究。

[摘 要]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仔细阅读萧红的乡土小说就会发现, 其创作视角的选择、调整, 温情脉脉的灵魂探索, 充满灵性的自然描写, 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外国文学的创作经验, 其创作手法与辛克莱、史沫特莱、屠格涅夫、契诃夫、罗曼罗兰等有许多相通和相似之处。

[关键词] 萧红; 乡土小说; 外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5-0546-05

20 世纪的中国是中西方思想文化大交流、大融合、大变革的时代。站在时代前列的作家更首当其冲, 经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萧红就接触过许多外国名家的作品, 她本人提到的有: 美国的辛克莱、杰克·伦敦、史沫特莱, 法国的罗曼罗兰、巴尔扎克, 英国的夏芒、约翰·曼珠斐尔, 德国的雷马克、丽洛琳克, 俄国的屠格涅夫、契诃夫、班台来耶夫等。在别人的回忆中还谈到她中学时曾迷恋托尔斯泰、莫泊桑的作品, 且酷爱俄国的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仔细阅读萧红的乡土小说就会发现, 她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外国文学的创作经验。

一、创作视角的选择与调整

与大多数闺秀派作家不同, 萧红的文学创作, 是以反映东北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不幸生活状况开始的。这种审美观照直接反映出她的创作视角, 而创作视角的选择, 一方面与她从小生活在贫穷和不幸的乡间, 早早领略了人生辛酸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辛克莱创作的影响分不开。成名后的萧红曾回忆中学里读辛克莱作品时的情景, “在那时节我读着辛克莱的《屠场》, 本来非常苦闷, 于是对这书用了一百二十分的热情读下去……这本小说和中苏战争同时启发着我”^[1](第 1078 页)。在其他文章中, 她还谈到辛克莱的《石炭王》和剧本《居住二楼的人》, 可见她对辛克莱的作品是十分关注的, 也是非常推崇的。辛克莱以揭露和批判美国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而著称, 其作品在这个因不满周围环境而苦闷的女孩子心中引起强烈的感情共鸣, 当她开始拿起笔来, 走上文坛时, 她的创作中充满了“辛克莱”式的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下层劳动人民命运的深深同情, 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社会批判精神。她还托人将自己的《生死场》送给辛克莱, 辛克莱也曾给她寄来热情洋溢的回信。然而, 实事求是地说, 辛克莱的创作视角对萧红并不十分合适。从气质上来说, 萧红是那种敏感、纤细、柔弱、内向型的女子, 缺乏恢宏壮阔地谱写史诗的魄力和才力, 同时她的生活阅历和社会接触面也非常有限, 所以, 萧红早期这些作品, 在对生活的把握上比较浮泛、表面、缺乏深度, 人物形象单薄, 甚至出现不真实现象。例如《夜风》中那个革命者形象就是苍

白的、概念化的。这一点与辛克莱不无相似,辛克莱作品艺术上的一大缺陷也是人物缺乏个性,社会主义者形象概念化。从气质上说萧红是个多愁善感的女性,她自称是“苦作诗的香菱”。在哈尔滨这段文学实践的摸索之后,她开始调整自己的创作角度。《生死场》前半部便显露出这种转变的迹象,出现在作品中的是她熟悉的农人们,反映的是这些平凡的愚妇愚夫们的生活小事。《商市街》、《家族以外的人》、《手》等,都是取自她自己或身边人们的生活,她写起这些题材来,得心应手。虽然涉及生活的面窄了些(她以后的创作中没有再出现工人和革命者的形象),但写的是熟悉的生活,因而能把握得住,使作品形象逼真生动,情感灌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短篇小说《小城三月》、《后花园》等作品的完成,则标志着萧红创作角度的调整最后完成。此时,她已明确地认识到写熟悉的生活,才能最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艺术个性。萧红的创作角度的选择和确立显然受了契诃夫的影响。契诃夫对生活作审美观照时是十分注重细小事物的。他认为重要的甚至伟大的东西,往往是通过微小的不易觉察的东西表现出来的。契诃夫终身痛恨庸俗,“一般来说,我是热爱生活的,但我们的生活,县城的、俄国的庸俗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我从心底里瞧不起它”^[3](第723页)。他的多数作品都是描写小市民世界的日常生活,揭露着“琐事”的可怕势力和庸俗习气对生活的窒息。如契诃夫一样,萧红也认为身边的任何小事都是生活,只要抓得住,就是好题材。所以她后期创作里没有壮烈的斗争场面,没有重大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高大的英雄形象,只有小人物的平凡生活。如契诃夫一样,她的创作表现了她是那么痛恨着的庸俗琐事,也表现了她对“几乎无事的悲剧”的深深忧虑。《呼兰河传》描写县民们不辞辛劳,不畏严寒,半夜偷听自由结合的冯歪嘴子夫妻说话,以便第二天到处散布流言,为庸俗市井增添谈资;他们怎样眼睛发亮充满好奇心地聚集,眼望着小团圆媳妇被活活折磨致死。《马伯乐》则表现那些无聊食客的卑琐行径和苟安于上海的市民如何狂热地购买彩票。“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3](第154页)正是透过这些几乎无事的悲剧,萧红展示了“哀莫大于心死”的现实,反映出深沉的社会历史思索和深刻的批判力。她放弃了最初辛克莱式的反映生活面的宽广、时空上近迫的特点,而得到了契诃夫式的深刻。这种转变的原因,首先是作者的生活环境与契诃夫更为相似,而与辛克莱生活的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迥然不同。契诃夫生活在俄国封建宗法社会走向末路之时,而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状况也是一片颓废没落之气。更为重要的是,当作家对生活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后,其创作倾向上更接近于契诃夫。她与契诃夫的区别仅在于,她的创作是动情的,叙述中带有浓厚的主观情感,而不像契诃夫那样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冷静、客观。另外,在结构方法上她也没有削足适履地效仿契诃夫,而是创造着自己独特的东西。

二、温情脉脉的灵魂探索

寻求民族的出路,探索、自省民族灵魂,是19世纪俄国进步文学创作思想上总的特征之一。果戈里鞭挞着官僚地主阶层腐朽的灵魂;屠格涅夫探索着贵族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的精神状况和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在社会邪恶力量重压下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痛苦的灵魂颤动显示于人;契诃夫则在平凡琐事的描写中,剖析着民族特别是小市民的灰色灵魂……虽然他们同是作灵魂的探索,在角度上却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之中显示出杰出的文学家各自独特的美学特征:果戈里带着“泪痕悲色”,屠格涅夫却是温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种“热到发冷”后的“残酷”,契诃夫又略带忧郁的冷静。

19世纪俄国文学中这种民族的自省精神,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作家同样面对着衰微的国势,同样充满“忧患意识”,同样担负起了“改造国民性”的神圣使命。就挖掘人的灵魂来说,19世纪俄国文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深刻的,因而也最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作家,不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且赢得了众人的模仿。然而,与俄罗斯文学家一样,在自省民族灵魂时,20世纪的作家在表现手法上也有不同的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如热病人式的拷问灵魂的“冷

酷”,对于温和的萧红来说就是不太适合的。相比之下,她更能接受和理解屠格涅夫那种探索灵魂的方式。早在中学时代,她就酷爱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白净草原》等。在萧红极少的文学评论文字中,有一段对屠格涅夫的评价,针对当时有的人认为“屠格涅夫好是好,但生命力不强”的观点,萧红认为“屠格涅夫是合理的、幽美的、宁静的、正路的,他是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她进而指出,与屠格涅夫“走在同道路上的还有法国的罗曼罗兰”^[1](第 1087 页)。她欣赏屠格涅夫和罗曼罗兰作品中流露出来的诗意,欣赏他们在展示灵魂时倾注着强烈的主观情感。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卷五初版的序里把克利斯朵夫叫做“我的影子”,而屠格涅夫笔下那些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里饱含着作者自己的体验、感受和同情。萧红更多地借鉴了屠格涅夫、罗曼罗兰的写实方法,其作品带着鲜明的主观倾向且呈现出温情脉脉的现实主义,虽然萧红创作中既没有屠格涅夫的贵族气质,也没有罗曼罗兰的英雄气概。《呼兰河传》展示了在历史因袭的沉重阴影下,小城镇人们平庸的生活和他们精神上的麻木、冷漠、保守、愚昧。《马伯乐》则写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一个畸形儿的奴性性格。然而她在揭示国人的病态的灵魂时却带着浓厚的主观情感,呼兰小城的乡亲们始终牵动着她的心。在《呼兰河传》尾声里她倾诉着这样的思念:“听说有二伯死了,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么样了。”“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他们充满了我童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1](第 878 页)萧红非常同情这一群思想传统的善男信女,虽然他们也制造了悲剧,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帮凶,直接或间接地致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于死地,但他们同时又是更大悲剧的主角。他们本质上是善良、勤劳和诚实的。他们有极强的生命力,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扭曲了他们的正常人性,使他们从肉体到精神都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更可悲的是他们至死不悟、麻木不仁。萧红不忍心去讽刺挖苦他们,却将自己的痛心疾首的感觉和深深的忧虑寄寓作品之中。她曾深刻地指出,“中国人的灵魂在全世界中说来,就是病态的灵魂”,“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1](第 1284 页)。仔细咀嚼这番话,我们不难感受到,它带着深深的遗憾,甚至带着某种精神上的忧郁,因而又饱含着怜悯和同情。

作为一个感情丰富而细腻的作家,萧红还特别欣赏同是女性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不仅赞同她的女性立场和女性视角,而且借鉴她的艺术手法。萧红在评价史沫特莱《大地的女儿》时指出:“那本书所记载的多半是粗躁的声音,狂暴的吵闹、哭泣、饥饿、贫穷,但是她写得可怕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她是把他们很柔顺的摆在那里,而后慢慢的平平静静的把他们舒展开来。书里的人物痛苦了,哭泣了,但是在作者的笔下看到了他们在哭泣的背后是什么,也就是他们为什么而哭。”^[1](第 1111 页)

她认为把原本“粗躁”、“狂暴”、“可怕”的东西柔顺化,平静地舒展开来,不仅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还能更深刻地揭示其“背后”的原因。长篇小说《马伯乐》和《大地的女儿》在表现方法上就有某种相似。这里,萧红揭示了马伯乐的灵魂——人格分裂的畸形儿。但萧红没有把他简单化,他也有内心的忧伤,“他的两个眼睛常常闪视着悲哀”;他也感到全家人瞧不起他,他也感到那个伪善家庭令人窒息,他也厌倦满身铜臭气的太太,希望有一种感情上的爱。他所痛恨的事,自己又在做。如果说鲁迅笔下的阿 Q 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民的典型,那么萧红笔下的马伯乐就是抗战初期小知识分子的典型。马伯乐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他的孤独和悲哀,细细咀嚼起来,不难发现有萧红自己的感受,甚至带有无可奈何的自嘲。萧红探索民族灵魂时这种温和的、同情的、带有主观倾向的叙述风格,不仅与屠格涅夫相似,而且和史沫特莱相仿。当然,外国作家的影响不是直线型的,从根本上说,是萧红的个人气质、美学趣味决定了她在借鉴上的取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借鉴促进了她艺术潜力的发挥。

三、充满灵性的自然描写

美丽壮阔的东北大草原培育了萧红酷爱自然的灵性,寂寞孤单的童年生活又造就了她敏锐的感受力。出于对自然的热爱,她中学时代一度迷恋于野外写生。当她在外国进步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感召下,放弃美术而转向文学时,这种对自然的热情仍有增无减。成功的风景画描写,为她作品带来了迷人

的色彩和浓郁的抒情气息。出于对自然的偏爱,萧红对充满自然魅力的外国作家作品,也特别钟情。屠格涅夫、罗曼罗兰、还有散文《给流浪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中提到的夏芒和约翰·曼珠斐尔都为萧红所喜爱。他们对自然的爱和出色描写,同萧红的天性十分吻合,给予她种种启发。萧红同这些自然描写大师们至少有三点相似之处:

其一,自然被赋予个人人格力量,并具有象征意味。在两位(夏芒和约翰·曼珠斐尔)英国诗人的作品里,自然有了生命和灵气,成了自由、力量、美的象征,成了诗人理想境界的象征。在萧红的作品里,我们也发现类似的写法。《呼兰河传》中小城人们的生活是平庸乏味、刻板的,小城人的精神是保守的、麻木的,小城的空气是令人窒息的。但是,“我”家那个后花园却是那么富于生气,“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他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4](第203页)。

这里,倭瓜、玉米、蝴蝶,都人格化了,它们无拘无束,自由伸展,一往天真,这自由自在的后花园显然寄寓了作者对民主、自由的热烈渴望,具有一种象征意义。

其二,对大自然的动静、色彩有着敏锐的感觉。人们公认,在外国作家里屠格涅夫是细微地感受自然,精细地描写自然的圣手。打开《猎人日记》可闻鸟叫虫鸣,可见晨雾或晚霞,可感受到森林和草原的活力。读者就像被引进了一幅幅的风景画中,用心感受着大自然,同它交谈。如果他“在树林里仰身躺下和向上望着”,会看见“树木不是从地面上升起来,倒仿佛是很大的植物的根掉下来,垂直地落到那些像玻璃般明亮的浪波上;树上的叶片,时而像绿宝石那样透亮,时而又变成金黄色,变得几乎是墨绿色”^[5](第152页)。这样精细、美妙的画笔真是令人叹服。有趣的是,这种细微的感觉、精工的描写,在萧红创作中也俯拾即是。萧红就是自然的精灵,蝴蝶、蜻蜓、蚂蚱、小花、小草,在她笔下都神气活现,充满情趣。连园中的一颗大榆树,她都能感受出种种细微的变化和声响来,“来了风,这榆树先啸,来了雨,大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4](第201页)。

其三,以乐景写哀。郁达夫曾评论屠格涅夫,说他最善用人景反衬的写法。譬如春天,年轻的恋爱者,一对对在那里寻欢作乐,而道旁有一个破衣丑貌,在那里对花溅泪的穷人,这时候的自然风景,分明是在嘲弄这穷人。《猎人笔记》中有许多地方大自然的美景都同农民非人的生活成为对比、反衬。在结尾篇《森林与草原》中,作者特意安排了这样一幅情景:在一望无际、辽阔无边的美丽大草原上,穷人拖着疲累的步骤走着,地主坐在六匹马拉的大马车上,一个仆人侧坐在马车后的脚踏上,泥污溅到了他眼眉边^[6](第419页)。这里,生机勃勃的草原同疲乏的农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丽的自然风光同凋敝的农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而更映衬出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和农奴制的罪恶,画面之外散发出淡淡的忧愁。萧红也是这样,她没有将自然看成是逃避现实的乐土,而是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祖国、人民命运的深深忧虑寄寓在自然景物画中。散文《春意挂上了树梢》的画面是那么令人心酸:春天来了,暖风吹拂,树木发芽。但是在春意浮动的街道上却传来叫花子的声声乞讨。自然之暖意更加剧了人生的凄寒。同样,小说《后花园》里,热热闹闹的后花园反衬着冷清清、黑洞洞的磨房;生意盎然、自由伸展的瓜果、花草反衬着冯二成子被压抑的未老先衰的生命;花儿越红,越是火辣辣的热烈,就越反衬出小团圆媳妇、王大姑娘等美丽生命夭折毁灭的悲哀。那一幅幅生动、鲜活、充满灵性的风土画,初读起来是那么赏心悦目,而掩卷深思又给人那么强烈的震撼。

总之,萧红本是幽微灵秀的女儿,又不同程度地受到辛克莱、契诃夫、屠格涅夫、史沫特莱等的影响,她的文学创作与外国作家作品既有种种相通相似,又有着鲜明的个性风格和强烈的主体色彩。她始终眷恋着自己的故土,总是从呼兰河畔那熟悉的生活中提取素材,将家乡的劳苦大众特别是下层农民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深入细致地表现他们的生存常态,使她的作品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另一方面,她的审美观照又有着宽阔的文化视野,充满现代意识的反思,她以一种全新的眼光,俯瞰东北草原世代相因

的生存方式、思维习惯、感情交流和价值取向,因而其笔下的乡风民俗又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折射出深沉的民族心理,厚重的文化沉淀。那一张张熟悉而又充满隔膜的脸庞,那一副副麻木而又彷徨的神情,那一个个令人悲悯又令人叹惋的病态灵魂,都是活生生的历史文化的载体,都凝结着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沉重的人生思考和执著的精神求索。也正因为此,萧红的作品清新、童真、本色、灵秀,完全属于她自己。

[参 考 文 献]

- [1] 萧 红. 萧红全集[M].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1991.
- [2] [俄] 卡普斯金.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8.
- [3] 鲁 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 [4] 黄海晴. 萧红作品精选[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
- [5] [俄] 屠格涅夫. 猎人日记[M]. 北京: 燕山出版社, 1999.
- [6] [俄] 屠格涅夫. 猎人日记[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责任编辑 何坤翁)

Foreign Literature & XIAO Hong's Aesthetic View

ZHANG 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Foshan University, Foshan 528000 Guangdong China)

Biography: ZHANG Hua (1957-), fe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Fos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Abstract There are countless ties betwee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 detailed reading of XIAO Hong's regional fictions will lead to the discovery that her literary creation has, consciously or subconsciously, borrowed in the experiences from foreign literature, such as in selection and adjust of view angle, the emotional exploration into human soul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natural scenery. Her creative skills bear many similarities with that of great masters like Sinclair Lewis, Agnes Smedley, Ivan Turgenev, Anton Chekhov, Romain Rolland, etc.

Key words: XIAO Hong; regional fictions; foreign literature